

## 從布勞岱的史觀分析東海與西屯的關係

彭懷真館長

### 一、引言：布勞岱觀點的啟發

東海大學擁有豐富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被忽略的是與所在地--台中市西屯區的。Benedict(2011)分析最主要的文化基礎有五：1.文化遺業(cultural heritage)：這是前人所累積並傳遞下來的各種文物或典章制度。2.發明(invention)：所有新文化的創造與發明。3.採借(borrowing)：透過文化接觸與傳播，借用別的社會的文化。4.前三個來源的修正(modification)：將文化遺業、發明和採借三部分加以修正以改變文化的某些形態，截長補短來配合自己的社會狀況使用。5.涵化(acculturation)：社會或團體將新文化特質融入自己生活中的過程。文化經由創新(innovation)或傳播(diffusion)而來。東海大學承接了種種文化遺業，又創造出新的。在承接的文化之中，有一股力量明顯被低估，就是來自「台中市西屯區」這塊土地的。

我在這塊土地生活很長很長的時間，向許多校內、校外長輩學習。對於大自然、人際關係等，長輩常常能提出具有智慧的見解。為何如此呢？政策分析大師林布隆(Lindblom)指出：有學問的人很多，知識淵博的人有很多，但年長者總是能將知識以淺顯的方式，變成更為有用。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林布隆教授的策略是發展「有用的知識」，將社會科學中的專業知識應用為能解決社會問題的決策(張世賢，1982)。許多老人表達能力好，總是能以清楚又明確的語言，配合絕佳的記憶力，將專業知識轉化成有用的知識。

專業知識要成為有用的知識，歸納林布隆教授的觀點有四個重點：合乎價值觀念、令人相信折服、盡量謀慮周詳、力求一針見血。年輕時，知識主要在課本中，隨著年歲漸長，知識與生命經驗結合，漸漸累積出智慧。如同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Braudel,1982)所說：「文明是過程而不只是情境，是航程，而不是港口。」文化不是固定的點，而是綿延的過程。

我在文化方面的思考，經常參考布勞岱的方法，這要追溯到民國七十二年，到東海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花了幾年研究歷史社會學，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啟發。在恩師高承恕教授的帶領之下，詳讀了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勞岱(Braudel)三冊《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還有他所寫的多本著作與專文。在博士班資格考時，選考歷史社會

學，還記得那一科早上九點開始作答，共八題。內人中午、晚上、消夜都送餐，寫完之時已經是凌晨兩點半。虛弱到無法下樓，還是內人騎車來撐著自己回家。

以下借重布勞岱的一些著作與觀點，一方面陳述年鑑學派大師的論點，一方面用此論點說說東海與西屯的關係。

## 二、set of sets

布勞岱分析事情的方法深深影響我，包括擔任圖書館的館長。首先是 set of sets，意思是集合的集合，各種現象都可以成為集合，都是某種連結，而各種集合又是更大集合的一環。例如東海大學，內部有各學院及行政單位，都是集合，一個學院有好些系、一個行政處有幾個組，共同組合了東海大學這個集合。至於逢甲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台中啟聰學校、西屯國小等，都是西屯區裡的學校，都屬於「西屯區教育機構」。又如台中榮總、澄清醫院中港院區、溢恩診所等都是「西屯區醫療機構」。另外有政治性的組織，如西屯區公所、39 個里辦公室。還有大小企業、商家、店面等，各種機構共同組成「西屯區的組織」。

所以舉辦〈西屯學特展〉，目的之一是將東海放在西屯區之中，看到這些法人組織如何設立、發展，又彼此連結。例如東海大學與台中榮總近年來有密切的合作，東海的圖書館與台中榮總的圖書館也合辦了許多活動，包括配合世界書香日而有的講座、交換書展、電影賞析、書目療法等。

我長期研究法人，撰寫《非營利組織：12 理》，探討法人的發展，也分析社區，深深瞭解透過「自然人」的關係強化「法人」運作的重要性。社區、機構等都是「法人」，機構間的關係是「法人」之間的關係，。社群關係包含了法人間的關係也包含了自然人與法人的關係、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的。在「實踐社群」這樣知識分享與移轉的團體，如果是團體，偏向「自然人之間」的關係。如果社區居民組成了社區的組織，按照政府各項規範去運作，辦理各項活動，就有「法人」的力量，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當然，自然人的連結十分重要，尤其在地方關係的經營上。昔日的梅可望校長、王亢沛校長都特別重視地方的關係，梅校長還創立大度山聯誼會，廣邀地方菁英幫助東海。東海因此與西屯區最重要的家族---何家有了深刻的情誼。

西屯區有 39 個里，其中有六個里以「福」字開頭，多數是近年來新設的。更多的是以「何」字開頭的，有九個里，也就是人們熟知的「何厝」那一帶。何厝莊為早期何氏宗親聚落，如今包括何源、何仁、何德、何福、何安、何厝、何明、何南、何成等九里範圍，東至精誠路、太原路與西區相鄰；南至大隆路、大墩路、大墩十七街與南屯區相鄰；西至文心路二段與惠來里相鄰，北至長安路一段、文心路三段與大河里為鄰；臺灣大道及文心路為其交通主軸。

何家長期是台中市的首富，何傳、何永、何義兄弟創設了「永豐餘紙業」，也創立了社會福利文教領域知名的信誼基金會。何家持續支持東海大學，近十幾年來東海大學所獲得最大一筆捐款就是來自何家，「大智慧科技大樓」能夠興建，少了何家是蓋不成的。

此次的西屯學活動可說是幾位西屯人所催生，我在社工服務領域結識了曾經擔任市議員、民政局長、社會局長的張國輝先生。他是西屯人，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持續研究西屯，著有《消失的青埔》等專書。我帶領幸福家庭促進協會的團隊長期與社會福利界的領航人合作推動各項服務方案，今年趁著新書問世，本館參加發表會，與各方連結，站在知識保存的角度，積極投入西屯學的論述和展覽。

### 三、升斗小民、行行業業都可貴

特定人物固然重要，小老百姓才是主體。許多人看歷史，注意的是那些英雄創造了時勢，特別留意特定人物。布萊岱則仔細分析升斗小民在日常生活裡點點滴滴的努力，如此就帶動了經濟活動。在第一冊《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的限制與不可能》(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裡，看似很瑣碎地描述食衣住行的事物，普羅大眾每天忙忙碌碌，成為商業活動的參與者。

放在西屯學的研究來看，我們也不強調英雄、偉人或政治領袖，帶著尊敬的態度，試著廣泛紀錄無數各行各業的人民所改變的這塊約四十平方公里土地。士農工商等三百六十行，都是貢獻者。

「三百六十行」大致可分為：農業、作坊、商店、飲食、瓜果、小菜、攤販、花鳥、修補、娛樂、文化、服務、醫藥、交通、員工、苦力、巫術等。單單以農業來說就有：耕田、鋤草、腳踏車水、手推車水、牛拉車水、

割稻、板網、捕魚、牧牛、養鴨、叉青蛙、捉棉花、紮棉花、採桑葉、剝蠶繭、紡紗、殺豬、狩獵、椿米、磨墨、繡花、成衣舖、湖絲阿姐、糊宮扇、燈籠坊、草蓆坊、竹窗坊、竹編坊、草鞋坊、刀刺手腕、養豬(藍翔、馮懿有，2005)。這些行業在西屯路、何厝那一帶，多少能找著一些。

地理上的因素創造了「可能」(possibility)卻也產生了「限制」(limits)，還記得博士班上課時為此爭辯，究竟何者的力量更大？我一向樂觀，認為改變歷史的力量主要來自「可能」，同學多不以為然，認為「限制」才是關鍵。隨著年歲漸長，愈來愈發現人們總是在限制裡掙扎，試著拼出未來。限制絕對不能低估，例如農林漁牧等第一類產業，西屯區不靠海，沒有高山，又欠缺開闊的放牧空間，只有農業興盛。也因為上天厚賜充足的陽光、雨水，對於稻米的栽植有利。

### 三、東海幫助西屯迎向世界

造成文化的差異力量很大，文化相異性因而，馬克與楊格(R. W. Mack & K. Young)在《社會學與社會生活》中指出：「由於每一社會在滿足人類相同的基本需要時，所用方法和所採取途徑迥異而致。滿足需要方法和途徑的不同，主要受地理環境不同、遭受孤立的程度不同、各民族自我導向(directionality)不同所影響。」居民若受到地理的或社會的孤立，則與其他民族的接觸面狹小，因而享受不到文化傳播的實惠，參與度及接觸程度有限。在台中的個行政區之中，西屯區因為交通的位置、政治的中心、學術的興盛，與外界的接觸特別頻繁，是最活躍的行政區。

東海大學在西屯對外連結方面，一直扮演重要角色。這是第一所私立大學，由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會捐資，在創校理念原本就與世界高度連結，大批來自美國和各地的老師在此教學、研究也生活在此，當然也帶動東海及西屯更多與外界接軌。可以說，東海幫助、促成、刺激著西屯乃至整個台中迎向世界。

台中市的中心原本是在中區，以民權路為主軸。台中市政府及台中市議會搬遷到現在的位置，使中心點漸漸西移。高速公路經過西屯，有中港交流道，該處的「朝馬」是潮洋莊、馬龍潭(又稱馬鳴潭)的合稱，為國道客運樞紐。

在高速公路以西(或稱筏子溪以西的部分與東海的關聯性更高，包括三

大區：第一是下七張犁：原下七張犁莊、賴公厝(蓮峰堂)、瓦厝底、虎寮埔、過溪仔，今協和里的安和路、啟聰學校附近。第二是水堀頭：現今西屯路三段的永安里、福安里之通稱。第三是林厝莊：原三塊厝仔、三角埔、十三公墓附近，今福雅路、安林路一帶。

從這些具有古早味的地名可知西屯原本是很鄉土的，相對的，東海是這塊土地上最西化的：路思義教堂、畢律斯鐘樓等，在這美麗的校園與周邊相遇，很有意思。

愈是現代化的地方愈懂得善用外界的資源，對外也愈開放。布勞岱就舉例說，中國的技術是「早出發卻晚到達」。因為中國人的各種科技發明都很早，卻沒有好好利用，以致坐失科學發展的良機。舉例而言，西方民族的興趣在於控制自然和物質，因而研究科學和工藝學的風氣很盛；反之，東方民族興趣在於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從而傾向於人文和人生哲學的探究，而西方重視的科學和工藝的發展，常被東方人視為雕蟲小技。

中部科學園區比南部科學園區晚設立，但發展非常快，或許因為西屯區的居民習慣擁抱世界，因而進步神速。中科的蓬勃也帶動西屯的改變，相對的，中科靠北的潭子端，由於居民較保守，又欠缺大學的支撐，改變較小。

迎向世界太重要，《打開大門，讓世界進來--給大學新鮮人的一封信》是我在 2006 年與哈佛大學大學部 Harry Lewis 院長、張光正校長、洪蘭教授、傅佩榮教授合寫的書，我們都強調：迎向世界最重要，西屯區處處迎向世界，有世界級的中科、有世界級的國家音樂廳，當然最早也最重要的是世界級的東海大學。倘若抱殘守缺，絕對無法快速發展。

#### 四、活躍的交換與商業之輪快速轉動

布勞岱第二冊《形形色色的交換》強調商業之輪(wheel of commerce)轉動，從結構視野談各類商人、貿易工具及歐洲以外的市場經濟。他強調商業活動有不同層次，有些人以物易物、有些人只與附近的人交換，有些人懂得與遠方的人交換。經濟不是以一種形式，而是以多種形式同時存在。人們喜歡描述那種被稱作市場經濟的形式，經濟科學的也是依據這些看似「透明的現實」進行論述。作為市場經濟獨特標誌的競爭並未全面支配整個經濟活動，在市場之下存在一個不透明、卻是每個人到處都會遇到，最起碼、最基本的活動—物質文明。它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近距離的物物

交換、勞務交換。

金融體系也有差異，早期在西屯最重要的是西屯區農會，日後各信用合作社、銀行、金控等蓬勃興盛。長億集團曾將總部設在西屯，藉此擴張金融和商業活動的地盤。

東海大學此一高等學府提供的是知識與智慧，東海師生所創造的知識，所累積的智慧，所提供的服務，都成為改變西屯的動能。也由於許多師生對基督教信仰的服事、對社區的關懷、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在宗教、社區服務、社會福利等方面，提供重要的改變。

布勞岱第三冊《世界的時間》(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穿越時空討論各國各時期的經濟，資本主義興起對歐洲的衝擊等。布勞岱爾將日常生活視為經濟底層，中層是較有計畫、體系的「市場經濟生活」，最上層是資本主義機制。

以西屯區為例，有二十幾萬居民，還有數以萬計為在此設籍的東海、逢甲、僑光科大等師生、中科員工、台中工業區員工等，加起來超過三十萬人。到了周末，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在新光三越、大遠百附近消費，都使經濟底層的活力旺盛，各種市場經濟活動蓬勃。至於高層的資本主義活動，因為並非銀行聚集之處，也不是政治舞台的重鎮，西屯區必非重鎮。

布勞岱強調商業之輪轉動要有中心點，由熱內亞、安特衛普、然後威尼斯是最為人關注的成功案例。接著以威尼斯作為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讓位給北方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交棒給倫敦、倫敦被紐約取而代之，至今，紐約依然是商業之都。

近年來帶動西屯商業活動最重要的改變力量是中部科學園區的設置與發展。中科有四個基地，最大最重要的是台中基地，位於台中市大雅區及西屯區交界處，北邊有軍方設施與清泉崗國際機場。東臨筏子溪、中山高速公路以及高鐵。西邊是大肚山頂，有內政部所屬的「台中都會公園」。中科有眾多廠商，吸引了國內外無數人才在此工作、在附近居住。

台中市的人口超越高雄市，而且差距漸漸拉大，關鍵原因是台中市有中科，南科在台南市，高雄欠缺旗艦產業和產業聚落。西屯成為產業聚落最重要的地方，西屯與中科，相互改變。以 1981 年為界，每五年的人口都

持續增加，前二十年成長幅度都超過百分之二十，近十五年仍在成長。到 2019 年 4 月是 229,381 人，已經是 1981 年的三倍有餘。

表 1：西屯區人口的變化

<b>1981</b>	72,552	—
<b>1986</b>	93,768	+29.2%
<b>1991</b>	117,068	+24.8%
<b>1996</b>	148,426	+26.8%
<b>2001</b>	177,288	+19.4%
<b>2006</b>	195,444	+10.2%
<b>2011</b>	209,672	+7.3%
<b>2016</b>	224,601	+7.1%

### 五、東海有助於非物質文化的改進

中科帶來的主要是物質文化的改變，文化內容大致分為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與非物質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前者是指人們所創造出來與使用的器物，小自筷子、大至中科管理局的建築物摩天大樓等。物質文化當然有影響力，這些「物質」「存在」「生產方式」的力量為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但也不能忽略「形而上」的思想、風俗、價值、信念等非物質文化的力量。

非物質文化包括兩種成分：規範文化(normative culture)和認知文化(cognitive culture)。規範文化指用來約束人們社會互動的規則與標準，包括民俗、民德、法律等。認知文化則是一個社會所擁有，為大家所共享和瞭解的思想實體，包括語言、象徵、知識、信念與價值等(Calhoun, Light and Keller, 2006)。

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在變遷方面速度不一，常常是物質文化先改變了，而非物質文化則改變得慢。奧格本(Ogburn)把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特質不等速的變遷所造成的差距稱之為「文化差距」(cultural lag)。在東海附近，由於社會變遷特別快速，處處可以見到「文化差距」及相關的紊亂現象，讓無數老西屯人感嘆甚至難以適應。

如同布勞岱所說：「我覺得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必須從一定的經濟實體和社會實體出發，進而為這一過程開闢道路。」他分析地中海等的發展，得到的結論是：第一項顯而易見的條件是要有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為此必須有地理、人口、農業、工藝和商業等一系列因素的協助。然而，

社會必須從旁協助，打開綠燈。東海大學作為重要的社會力量，應該從旁協助西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 六、結語：地中海 vs. 東海

我在 1974 年在梅可望校長身邊完成《東海 30 年》的編輯，1995 年應程海東校長邀請擔任「東海五十周年活動的總召集人」，那時五十周年校史另有負責人，我與校史的整理無關。這兩回不同的經驗使我想到了：如果要為今日的東海寫歷史，暫時定名「王茂駿校長階段的東海和東海所處的世界」該如何著手呢？在舉辦〈西屯學初探〉系列活動之後，也許可以參考布勞岱的巨作《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該書分為三大部份：

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以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性格表示地理環境對人文的深遠作用。

第二部分討論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他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就是「總體歷史」。

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敘述。

三個部分所代表的歷史時間皆不同，第三部分敘述的政治事件呈現的時間很短暫，第二部分涉及經濟活動，影響的歷史時間較長，而第一層中地理因素影響歷史的因素最長。

王茂駿校長階段的東海顯然與梅可望校長或程海東校長不同，單以地理環境來看，昔日沒有中科、沒有快速進步的西屯區、沒有兩個高速公路帶來的人潮、沒有二十多萬的西屯居民。

在年鑑學拜之前少有歷史家重視歷史的空間，而布勞岱強調空間也提醒「長時段」(long-duration)的重要性。他認為歷史可區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long-duration)，歷史學家應多研究長時段的發展，而不是僅去對短時段的政治軍事等事件作詳細研究，要從數十年的中時段的週期波動的探討中，進一步找出百年甚至數百年以上長時段中，整個文明的發展趨勢以及延續於其中的基本社會經濟文化等結構。他撰寫專文《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作了很好的示範。

所以如果要分析此時的東海大學，應該結合時間、空間，而非僅僅看領導人或某些專案或某些活動。